

A  
DIFFERENT  
SHADE  
OF  
BLUE

# 另 一 种 蓝 色

李红霞◎译 任士英◎校译  
〔美〕ADAM EISENBERG◎著

# 警 言 女 图 雅 西

HOW  
THE F

GED  
ORK



知 藏 出 版 社

A  
DIFFERENT  
SHADE  
OF  
BLUE

另  
一  
种  
蓝  
色

李红霞◎译 任士英◎校译  
〔美〕ADAM EISENBERG◎著

西雅图女警

HOW V  
THE FA

ED  
RK

图字：01 - 2012 - 4126

Copyright© 2009 , 2011 by Adam Eisenberg

All rights reserved.

Adam Eisenberg

A Different Shade of Blue : How Women Changed the Face of Police Work , Published by Behler Publications , California ,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另一种蓝色:西雅图女警/(美)艾森伯格著;李红霞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2012. 3

ISBN 978 - 7 - 5015 - 6351 - 7

I . ①另… II . ①艾… ②李… III . ①女性—警察—访问记—美国—现代 IV . ①K837. 128.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7863 号

**策划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于淑敏 施楠**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61 千字**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5 - 6351 - 7**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译 序

蓝色，是美国警察制服的颜色。

《另一种蓝色——西雅图女警》是一部独特的纪实作品，通过作者的采访和女警的回忆，以质朴无华的语言、真实感人的内容，深刻地描写了美国西雅图女警。西雅图最早的女警归妇女部管理，直到该部解散后，女警们才被分到警察局工作。书中描写了她们对工作的态度、欢乐与烦恼，以及警察工作对其个人的爱情、婚姻及家庭的影响。她们和男警察一样，每天要面对居民，处理各种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但要比男警察付出更大的代价和牺牲。女警这种甘冒风险而换来大家安宁的品质，愿为公众排忧解难的高尚品格，日日夜夜出没于大街小巷、置身于危险而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奉献精神，值得人们赞扬和钦佩。同时，人们也应该对她们遇到的种种困难和烦恼表示同情和理解。

本书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女警的情况，依次介绍到当代女警的工作。女性从警之初，从事简单的社会工作，处理性侵犯案件和虐待儿童案件。随着女警的增多，其工作范围也在扩大。直到 1976 年春天，女巡警的出现意味着女警与男警在所有警务工作领域平等竞争。

伴随女警的出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女警面临着诸多

的歧视和偏见，有的来自一起工作的男同事；有的来自顶头上司；有的来自从警之初对她们进行训练的教官；还有的直接来自她们服务的民众。女警在训练、工作以及晋升过程中都面临着一定的障碍，但女警们有自己的生存战略，不断地努力奋进，创造着属于她们的神话。

在女警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性骚扰的困扰，也存在对女同性恋的歧视问题。有些女警采取沉默态度，这也是警务工作中的一个潜规则。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平权法案，亦即扶持行动，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反向歧视，是用降低标准的办法录取美国人中的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女性等，给予其就业和升职机会。女警的增多也受到平权法案的影响，但是对这一行动的评论却褒贬不一。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译者作为共和国预备女警之一，心中感慨万千，对警察这一神圣职业，又有了更深的理解。本书的翻译是在恩师任士英先生督促下完成的。任先生在校看译文的过程中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本书第9章的翻译还得到师兄滕家红的帮助。对于书中涉及的专业问题，译者还请教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王华博士。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的张轶老师、霍新新老师和比较警察研究方向导师组的全体老师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帮助和支持。感谢他们。

因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疏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原 序

安·鲁尔<sup>①</sup>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加入西雅图警察局时，女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飘渺难测的。在位于詹姆斯大街与樱桃路之间的第三大道上的公共安全大厦三楼的妇女部，有老、中、青三代女警的代表人物在那里工作。

当时，那还是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豪华的大厦，能很好地满足警察局的需求。

第四大道入口处的铜匾上镌刻着：世上本无公平，人类自己创造。但需遵守法律，同样生活幸福。

在余下的近半个世纪里，我不止千遍地读过那副匾，它早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安全大厦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肮脏、拥挤不堪，最终被废弃。在它东边不远处，有一座新的大厦拔地而起。1954年，我怀着对新工作的激情及诚惶诚恐之心，进入大厦。如今，这个崭新的大厦和当时一样豪华。

我所工作过的警察局早已是被废弃的碎石瓦砾，与第三大

---

① 安·鲁尔是《身边的陌生人》（*The Stranger Beside Me*）、《无私奉献》（*Small Sacrifices*）、《致命危险》（*Mortal Danger*）等畅销书的作者。——译者注

道之间的距离感刺痛着我的心。如今，在我的花园里，摆放着一块来自公共安全大厦的大理石。对我来说，它是对那段时光的回忆，也是对我要当警察这一夙愿的见证。

从华盛顿大学毕业一周后，我申请成为一名西雅图警察，当时我还不满 21 岁，要学的东西很多。即使这样，我仍然在俄勒冈州一个女子训练学校实习，晚上在东阿尔德一个收容少年犯的青少年服务中心工作，并学习华盛顿大学开设的每一门犯罪学、刑罚学及心理学课程来充实自己。回忆过去，想到自己对好人与坏人的世界了解得太少，真是觉得难为情。

对于安排我进行有关性骚扰的审讯，我没有任何经验，对所用的术语一点儿都不了解，但我仍然假装驾轻就熟。我倾向于审视人们的面部表情，很快就学会透过说谎者平静的表情发现问题，进而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我带我的第一个“罪犯”到港景医疗中心时，把她弄丢了。当时还没有来得及移交，她说头晕，让我给她找个床位休息。我离开她大约三分钟，当我回来时她当然早就无影无踪了。

幸运的是，在我工作的第一周没有因此被辞退。非常幸运我能留下来，因为在西雅图警察局的那些年是我的人生顶峰之一。多年过后，我闭上眼睛仍能看见所有女警坐在办公桌前，很多人至今仍是我的密友。

队长和警长有自己的办公室，我们只能分散地坐在杂乱的能眺望第三大道的房间里。每个人拥有一张陈旧的办公桌、一个手工打字机及一部电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后写过几乎三打书的我却总是在写跟进报告。当警长发现我桌子抽屉里有成堆的便条时，便会责骂我。

妇女部的领导是艾琳·杜伦队长。她是一个小鸟依人般却充满活力的小巧女人。海伦·艾略特警长有着绅士般的举止，满头银发，这让我想起了埃莉诺·罗斯福。我很敬畏杜伦队

长，也经常担心让艾略特警长失望。

正如亚当·艾森伯格在《另一种蓝色》一书中讲述的那样，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女警在警察局工作，B.J.比约恩森负责处理精神病案件（西雅图警局官方的说法是处理了220件），弗恩·惠勒负责处理性犯罪。也许她们只有五六十岁，但那时对我来说她们有点儿老。作为女性，她们很是强壮，B.J.未婚，灰色发辫紧紧缠在头上，并且从不化妆。弗恩将头发染成介于紫红色和茶色之间的一种奇特的发色，浓妆艳抹。B.J.的办公桌在妇女部的一角，而弗恩则在楼上的风化部工作。

是啊，这就是半个世纪以前，她们所谓的处理性骚扰的机构。这听起来好像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所受的侵害负有责任。这根本不是道德问题，它处理的是有性动机的暴力犯罪及性变态。

弗恩·惠勒坚毅严厉，甚至有点儿愤世嫉俗。在处理性犯罪和诈骗案的男警探们无序的办公室中，她比他们年长，比他们更有经验。弗恩控制着整个房间，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她。

凯·图希格大概40岁，留着卷曲的红头发，是从西雅图警察局其他部门退下来的。海伦·梅·格里菲斯与她同龄，白肤金发，像凯一样，有点儿丰满，但是恬静羞涩，而凯的声音则是沙哑的。她俩背靠背的办公桌在杜伦队长宽敞办公室的门外。

后来录用的人有：菲利丝·科温顿、凯·卡伦德、海伦·卡拉斯、玛丽·斯托、诺玛·艾历克斯、让·塞尔瓦吉·邓巴、帕特·米克尔堡、乔伊斯·蒙哥马利·约翰逊以及那些临时工作到下次公务员考试时的人。新录用的有罗斯玛丽·科德、简·保尔森和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也许是因为每个女人成为警察的道路不同吧。不久，我的大学同学诺

琳·斯卡恩成为助理局长，贝丽尔·汤普森和卡伦·埃吉德加入妇女部。

菲利丝又高又瘦，衣着很像时尚的模特。她有着大大的眼睛和凸出的两颊，这更突出了她模特般的外表。她的表情通常很严肃。凯·卡伦德身材也很高，经常试图保持体重，因栗色头发和漂亮的棕色眼睛而光彩照人。她的幽默感完全和菲利丝的性格不同。

玛丽·斯托比我们任何人在警察局呆的时间都长。不久前，她以中尉警衔退休。她有一头厚厚的金色卷发，喜欢用丝带扎起来。有时我们叫她“阳光玛丽”，因为在后面看她一点儿也不像警察。另一个老警员海伦·卡拉斯有着厚实的波浪形的黑头发，她健美而丰满的体型得益于其希腊血统。尽管她试图以粗暴的行为来掩盖，但还是能看出她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海伦是我所知道的最出色的警察之一，曾被评为《警探大师》杂志的“每月一警”。我很荣幸的是，写这篇文章时得到了她的鼓励。

让·塞尔瓦吉·邓巴身材娇小，体型苗条，非常能干。她和我都有新闻工作背景。让非常负责，思维敏捷。帕特·米克尔堡有着棕色的头发，夹杂着一些过早长出的灰白色头发，黑眼睛，总是亲切和蔼，平易近人。

诺玛·艾历克斯是年轻女警中唯一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但是她知道的东西比我们任何人都多，她教会了我很多。每当想起诺玛，我就会充满活力。那时诺玛是红头发，发型很像露西尔·鲍尔，脸上长着雀斑。奇怪的是，我难以想象诺玛正襟危坐的样子。

在妇女部，乔伊斯·蒙哥马利·约翰逊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直到她于2003年去世。离职后，我仍然会打电话给她，想问她是否记得我忘记了的事情，特别是当我写这篇序的时候。她对我总是很有耐心，经常邀我去她公寓吃饭，她的房租是一个月17美元，我和我一个大学时的

朋友以一个月 40 美元合租一套公寓。我从警时，每月的工资是 300 美元，6 个月后涨了 25 美元，我比其他朋友赚的都多。

乔伊斯来自明尼苏达州，高高的个子，是白肤金发的瑞典人后裔，在她二十几岁时加入西雅图警察局。但没过多久，她突发奇想地登上了停在老罗兹百货公司前面的肺结核病检测车。当测出她患有这种病时，她很震惊，遂辞去警察工作。她在冷杉地疗养院呆了一年多，做手术切掉一片肺叶。当最终痊愈时，她怀疑是否能重新开始警察生涯。

事实上，即使缺少了半片肺，乔伊斯仍然努力通过了警察考试中所有的体能测试，并在妇女部工作了很久。她处理性骚扰案件，有时也处理凶杀案，她尤其擅长复杂的审讯。

在我离开警察局后，我把乔伊斯介绍给了我在华盛顿州公共救助局的同事比尔·约翰逊。

三天后，我打电话询问这冒失的约会进展如何，乔伊斯说：“相当好。我们去了爱达荷州科达伦市，我们结婚了。”

我认为她在开玩笑，但是她没有。当乔伊斯去世时，她和比尔已经结婚 50 多年了。在他们秘密结婚后，我放弃了自己的媒人角色，因为我确信再也不会做得如此成功了。他们分享共同的兴趣和幽默感，还有一个女儿杰丝敏。约翰逊一家喜欢坐爱斯基摩划子式小艇航行；学会用草和芦苇杆编印度花篮；有一个大花园和一只约克郡小狗。不知何故，他们在卧室里放着一把真正的牙椅，而不是沙发。

虽然我是第一个临时性的警官，但我一直试图努力通过警察考试。考试从 IQ 测试到做 50 个仰卧起坐，再到在规定时间内跑完 4 层楼梯，但最终我惨败于视力测试，因为我近视度数高，不能看见最大的 E，甚至不能看见它后面的墙。负责测试的护士很同情我，因为她知道对于我要成为警察这意味着什么，她让我向前移到距视力表只有一半的距离。我仍然看不见

最大的 E，那时我们还不允许戴隐形眼镜，我试着做眼保健操，看有没有效果。事实上没有眼镜我什么都看不见。直到我 40 岁，眼睛变成了远视眼才足以看到视力表，才能通过考试，而那时我已经老了。

非常幸运的是，我能记录下警务工作和罪犯的性格，但我一直不是一名真正的警察，我只是在内心深处有对女警同僚们的回忆。

正如《另一种蓝色》中所说的，我们大部分人是受人们赞扬的社会工作者。我们的警务工作和当代女性不一样，我们不带枪和手铐，不穿制服，除非指定我们参加阅兵或者海上快艇赛。我们有警徽、电话亭的钥匙、允许免费乘公共汽车的通行证。每当看到现代真正的女警时，我就会想为何那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受伤。现代女警的制服有宽松长裤、防弹背心、可以跑的实用鞋子，而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穿着紧身短裙或者礼服，三四寸高的鞋跟，看起来根本不像去追捕或追逐某人，更像是去喝下午茶。

如果不想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我们通常会叫警车来支援以摆脱困境。

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雅图女警主要的工作是负责调查儿童的“危险的居住条件”；给受到性骚扰的被害人录口供；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孩；当男警抓到精神错乱的女性时要陪同办案。有时，我们还是调查诈骗犯的诱饵。

因为我有一张吉卜赛算命先生不认识的新面孔，所以开始时我做很多秘密的工作。为了钱而预言未来，这违背了流浪的原则，它本身并不太坏，但它通常会发展成为用报纸替换真钱，或者因预告危险与死亡而收取软弱的顾客很多钱。我记得那天我不得不逮捕一个有六个小孩的吉卜赛母亲，这些小孩都患有麻疹。其他女警不愿帮我移送他们，因为她们都有孩子，

不想把麻疹病菌带回家。终于，我努力把所有恸哭的小孩送到了港景医疗中心。幸运的是，我已经得过麻疹了。

一些警务工作也让我伤心。让·邓巴和我值夜班时，发现一个水手与一个瘸腿的年轻孕妇走进了一家出租小时房的乡镇旅馆。我们跟踪他们，当经理打开房门时，他们的苟合已经结束，那孕妇正坐在床头吃汉堡，显然这是对她服务的报酬。我不想逮捕她，但法律规定必须要逮捕。

回到公共安全大厦，我的未婚夫等着载我回家。他看到这个悲伤的犯人，迅速转过头去。他小声说：“安，我和她一起上过高中，我不想让她看见我，太尴尬了。”

我力主也逮捕嫖客，但是行不通，他们被无罪释放了。

我们这些临时警官的待遇有时像军队中的新兵一样，通常不和工作时间比自己长的女警争辩，我们是来学习的。一个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女警例行公事般地坚持要开那辆指定的警车，当我们的代号 77 和 78 被呼叫时，她从来不让我应答，即使在堵车并下着倾盆大雨时亦然。当我终于能按下按钮说“77 在”时，她从不放手让我做任何事。

这使我恼火，虽然有时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我没有和她争论。一个寒冷的夜晚，在办公室里，我接到一个以前处理过的女人的电话。她非常激动，说她和丈夫及孩子在一家贫民窟旅馆，她害怕会晕倒，希望我去照看孩子以免他受伤。和我在一起的上司说他们不可能在那，因为那家旅馆停业倒闭了，我坚持至少去那里看看。

我们发现一间屋子有人，他们都躺在一张床上，混乱的褥单浸透着啤酒，油渍斑斑。

昏倒的夫妇躺在孩子的头边，孩子已经处于窒息的边缘。我抱起他，放在怀里。和许多我们解救的小孩一样，他有虱子。由于某种原因，我没能救活他们。

有一个叫丹尼的五岁小孩，在一次日常护理中得了脑震荡。在医院里，我们看到他的脚跟长满了水泡，因为他的鞋太小了。据了解，丹尼的妈妈去皮吉特海峡钓鱼了。我们通过各种方式给她留言，甚至通过船接通无线电话，但是她没有回信。我看着那个有着大大的棕色眼睛的小男孩，多么想把他带回家，但那是不可能的。多少年来，我经常会想起他，祈祷他平安幸福。

即使那时不提倡凶案调查，我们仍然会挽救生命，并试图减少许多人经历的痛苦。几年后，当第一位女警探被安排在重案组时，那里的男同事把她的办公桌画成粉红色，无情地戏弄她。

虽然让女性巡逻、晋升警衔，但这仍不是一个简单的过渡。女子天生胜任多重任务，并且远远比大多数男性对人类种种行为的原因好奇得多，她们可以成为敏锐而成功的审问专家。男人有更强壮的肌肉，但是已经证明女警有特殊的技能，警务工作中的男性和女性取长补短，而非谁侵占谁的地盘。

虽然近视意味着我不能成为警察，但我从未真正离开过西雅图警察局。每年我都参加西雅图警局举办的“安·鲁尔优秀家庭暴力报告奖颁奖典礼”，很多次获奖者都是女警官，2008年依然如此。我看着获奖者，由她那同样也是一位西雅图警察的丈夫陪伴，两个孩子也来看妈妈领奖。我惊叹于身边发生的这些变化。

随着她们临近退休，我日益了解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西雅图警察局的女性。她们像坚固的堡垒，像早期杂志图片如《侦察》杂志上严肃的警察女舍监，这是在我成为记者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但我认为从没有提倡过她们去追贼、逮捕杀人犯或者经历赤手空拳的战斗。现代的女警都比较苗条，身材好，在罪犯审讯方面接受了扎实的教育训练。部分是街头警察或者巡警，部分仍是社会工作者，警衔的晋升超

越了玻璃屋顶及几十年的偏见。

就像本书中描述的那样，它确实是一个崭新的纪元。

## 前　言

当莉斯·埃迪在1981年加入西雅图警察局时，女警仍然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事物，很多男同事根本不欢迎她，她的第一个警长完全充满了敌意。他们初次见面时，看到她娇小的身材与体型，他竟然直言不讳地说：“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在警察局里你根本无事可做。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被录用的，但对你的解雇我会拭目以待。”

警长说到做到，批评她的所有行为，持续给她极低的工作评价。直到一些男同事和队长认识到她的价值，并帮助她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小队长，埃迪才看到未来的一线希望。虽然得到肯定的认知，但她对警长的话难以释怀。是她太弱小了？她属于警务工作吗？那些男同事是否真正接受了她？

一年后，埃迪突然发现自己在为生活而舍命奔波，每天的忙碌却没有带来应有的收获。

事情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改变。一次，当大多数警员正在调频时，无线对讲机在播报“警官在追捕嫌犯”，那时只有极少数警官能够应答。埃迪听到广播后驾车到这个警官最后出现的地点，在西雅图杜瓦米什河下游。埃迪发现了他的警车和另一辆车停在街道中间，警车驾驶室的门开着，但是没有看见任何人。

埃迪缓慢地开车经过被遗弃的车辆，转入附近一个装有运输集装箱的院子。她很快发现有3个人在河边遛狗，他们都不像通报中描述的嫌疑犯的模样——一个35岁左右穿着红毛衣的人——但埃迪慢慢靠近他们，希望能获得一些线索。

“我这样做时，其中一人慢慢跑开了，一条狗和他一起跑。”她说，“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在驯狗。在后面的两个人指着他的大致方位，我想或者跑开的人要指引我找到嫌疑犯，或者他知道一些信息。”

埃迪沿着河边跟随着那个慢跑者，他移动得很慢，但他一直注意着身后埃迪的方位。当她非常接近时，她摇下车窗，呼喊这个人以引起他的注意。

“他停下来，转过身，开始走向我的车。”她回忆说，“那时，我违反了最基本的警察安全条例，因为我在一手开车，一手拿起对讲机准备汇报时，腾出一只手打开了车门。当我正准备说话时，这个人走近车窗，撩起毛衣，掏出一支手枪。他用枪指着我的头说：‘别动’。”

“我没动，坐在那里，手里拿着对讲机。他要我去旁边，以便他上车。车上是斗式座椅，我的公文包在副驾驶座上。我慢慢地把公文包放在地上，小心挪动。在整个过程中，我的思绪飞转，思考自己该如何应对。”

这个人钻进埃迪的巡逻车，用枪顶着她的肋骨。

“他要我把枪给他。”她说道，“我说：‘好’，但是没有动。他再次用枪顶着我，并说：‘我告诉过你，把你的枪给我。’”

“我仍然没有动，我知道这样听起来有点儿傻，但我想：我可能会死在这里，如果我被杀了，我不想枪还在枪套中就这样死去了。我明白如果我迅速掏枪，他甚至在我掏出枪以前就会杀了我，因此，我用拇指和食指慢慢地掏枪，猜想着如果我

把枪拔出枪套，或许能更好地利用它。”

埃迪掏枪时，嫌疑犯将车掉头，但是他却有点儿困惑。

“我该如何出去？”他问道。

“那边。”她答道，手指顺着他的脸，指向驾驶室旁边的窗户，嫌疑犯的目光随着她的手望去。埃迪抓住他分心的机会，迅速推开他顶在腰部的枪，扑到他身上。这样做时，她试图重新抓住自己的枪，但是枪从她手上滑落了，落到这个人的膝盖上，又掉到车的门槽里。

“我抓住他的枪，试图抢过来。”埃迪继续说，“突然枪走火了，掉在地上。我抓起对讲机说：‘罗伯特1号需要帮助。’那个人向下看，发现我的枪在门槽里。他捡起来恶狠狠地说：‘好！好！’语气中暗示着他要得到它。他试图拿枪对准我的脸，我把双手放在枪上，试图控制它。突然，我的枪响了，对着门框发射了一枚子弹，恰巧打在这个人头部的上方。”

正当两个人争抢武器时，埃迪突然意识到一件更危险的事——警车正向河里开去。

“我想：天啊，我们将掉进水里，会被淹死的。”她回忆说，“他也一定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在离河边不远时，他急踩刹车。”

回到打斗中后，埃迪很难阻止这个人把枪对准她的脸，逐渐地，她弄弯了他的手，以便使枪口对准嫌疑犯。由于他的手弯了，扣扳机的手被枪拧着，他大叫出来，松开了武器，埃迪立即采取行动。

“我抓起枪，对准他的耳朵。我说：‘混蛋，我杀了你。’我真想杀了他，他惊呆了。”

这时，其他警察已经到达现场并听见了两声枪响，但是不知道枪声来自哪里。终于，一名警察发现在车里有人打斗。当他打开车门时，发现埃迪正用枪对准着嫌疑犯。警察把这个